

目 录

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	張邦永(1)
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	朱繼圣 凌其峻(23)
三才生煤矿投靠官僚資本的始末	黃明安(52)
天津的洋行与买办	畢鳴岐(69)
我在汉口礼和洋行十五年的見聞	張高級(98)
从日商若林药房到自办民生药房	王仲南(111)
旧上海的大賭窟之一——回力球場.....	毛嘯岑(123)
漫談黃楚九及其“事业”	平襟亚(146)
豫西旧社会軍匪橫行的概况	王凌云(158)
河南內乡土皇帝別廷芳.....	別光典(176)
我所接触的豫北紅枪会.....	王振民(190)
樊鍾秀事略	張 鈺(196)
我所知道的洪門史实	吳崧甫(207)
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門致公堂	司徒丙鶴(228)
包头流氓低层社会的“梁山”	刘映元(258)

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

張 邦 永

段祺瑞当政的中国政府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英法两国立即开始招募华工到法国战場上去。它們与段政府商定的华工数目，英国方面是十万人，法国方面是五万人，实际都是招足了的。法国所招募的华工情况我知道的太少，这里只說我亲身經歷的英国方面的情况。

一

那时我刚讀完清华学校的中等科，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度暑假。9月初开学时就将升入高等科，高等科四年毕业，就将享受公費留美的权利。但在8月20日，接到一封在北京消夏的同班同学刘沛章的来信，說他已在北京英国公使館考取头等华工翻譯，即将去威海卫編队；从威海卫坐輪船到法国战場上去；薪水是每月一百二十元，吃的、穿的和往返旅費，都不須自己付錢；并且說，除在战場上能够看見全世界最高的科学成就外，战后还可到欧洲各大城市去游历；又說招考还在进行，問我們愿不愿意应考。我們見信后，不但一些与刘沛章同班的中等科毕业生决定去考，高等科一年級的吳泽湘（1925年起在外交部工作），和高等科二年級的張保（1940年在重庆当国民党政府的稅务署长，更名張静愚），也都决定去。我当时

正感到經濟困難，連開學時買書的錢都沒有，所以也決定去。同去的共五人。

到北京英國公使館後，一個英國人用英語對我們五個人分別問了幾句話，就叫我們去檢查身體。檢查身體只是听听心脏，看看眼睛和生殖器，進行得也很快。此事一完，就宣布我們五人都考上頭等翻譯，同時給我們每人一張由北京到天津的二等火車票，和一封共同的介紹信，叫我們第二天就起程。天津的英國輪船公司看了介紹信後，立即派一名工人引我們上輪船，當晚就開了船。同船有五、六百名工人，有一個英國人領導。次日午後到山東半島東北岸邊的威海衛時，已有些人在碼頭上等着，一個人把我們五人領到翻譯房，其餘一些人則領了工人到帳篷中去。

當時的威海衛，只是一個鄉村模樣，市中不過一百來棟舊式平房，市外有一座小洋樓，是英國人住的。工人住的大片帳篷都搭在半山坡上；其中夾有五、六棟木房，就是翻譯房、辦公室和庫房所在。電燈電話，都是因陋就簡地新安裝不久的。統率這一切的人，是英國駐威海衛的領事，名叫馬斯(Moss)。

我們進翻譯房時，那里已有二十一人。六個是頭等翻譯，薪水同我們一樣，每月一百二十元；四個二等翻譯，月薪九十元；十個三等翻譯，月薪六十元。我遇到一個同鄉魯繼曾，四川保寧人，杭州之江大學三年級學生。他比我大六歲（二十六歲），已很會觀察事情。他說威海衛的事情辦得很快，已經開走了二千多人；青島方面開走的人還多些。他說英國人在青島方面招的工人，大都是山東的農民，招的翻譯則大都是從上海和漢口兩處來的。威海衛方面招的工人山東人占一半，天津來的也占一半，翻譯則都是北京和天津的學生。青島和威海衛兩方面的工頭大都是英國人，另外招有中國碼

头工人和教徒，其中也有些鉄路上的工头。我說：“据說，招募华工是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合办的，青島和威海卫大概都有中國政府的代表吧？”魯說：“沒有、沒有，你沒看見報上說的，段政府對外是宣而不戰，對內是戰而不宣么？”

第二天，馬斯找我們五人去談話，首先給我們看需要我們簽字的一份中英文對照的合同；條文我記不清楚了，大旨是：（1）中國政府已經宣布參戰，參戰是中國人民應盡的義務；（2）頭等翻譯的薪水每人每月一百二十元，一半由英國政府負責按月匯到簽字人家里，一半在法國按月發給簽字人另用；本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各項費用物資，概由英國政府免費供給，其等級與英國的尉官相同，但不給委任狀也不作戰；（3）戰事結束後，翻譯可到歐洲各大城市去游歷，往返途中也可游覽，旅費自備，英國政府也將給以可能的便利；（4）翻譯須服從英國軍官的指揮；（5）合同有效期間三年。

馬斯見我對合同沒有異議，就叫我簽字，簽字時我發現只簽一份給他，不照常例雙方各執一份。馬斯說，這是中國政府同意了約，合同中的條款有雙方政府担保，不必過慮。我也信以為真，當時很滿意。馬斯又叫我寫信回清華學校，多叫些同學來，郵費也不須我付，只把信交給他就行了。

當天下午我領到了三個月的薪水（三百六十元）和秋季的服裝。工人和工頭也是這樣，不過他們服裝的質量差些，工人的薪水是每人每月三十二元。工頭分三級，每高一級大約多六元，具體數目記不清楚了。

第三天上午，大家穿上新衣去編號。工人和工頭的號碼都是在銅片上打好了的，臨時把銅片卷成一個鐮子，用機器扎在他們手背上（直到三年合同期滿回到青島時，才用機器把銅鐮卸開取下）。

翻譯的號碼，則是自己到銀店里去买一个椭圆形的小銀牌子来打数目字，形式好看一点，也必須經常帶在右手上，只是不工作时可以自己取下来。从此以后，工人都叫号数，翻譯虽叫姓名，但須記住自己的号数(我的号数是四〇八四三)，有事时仍以号数为准。

編號之后，各人都捧着用粉筆写好號碼的小石板放在胸前照相；后来把相片貼在自己的薪水本子上。每次发薪时，領款人在薪水单上打手印，发薪水的英国人，則在各人的薪水本子中登記一笔。

第四天就編队。每班十五人，另加一个工头，他左右袖口上都釘好一条紅布带，所以普通叫他“一道”。一班人叫“一篷”，因为这十六个人同住在一个帳篷中，在威海卫是这样，后来在法国戰場上也是这样。三篷为一排，有一个“两道”的工头帶領。三排为一連，有一个“三道”的工头帶領。每营三連，有翻譯二人，和英国营长一人，合計四百四十七人。这是在威海卫时的編队。到法国海边的英軍华工总部后还要加些英国工头，下文再談。

編队后，每天早晚各下操一小时，余时可以自由活动。第一次下操回来时，营长到一个华工住的帳篷里，叫一个帶有辮子的华工張彥彬去剪辮子，营长的中国話說得很好，而且是北方話。張彥彬說：“誰也不能剪我的辮子，要剪就取消合同，給我船票和車票，我自己回河間县去。”营长說：“大家都沒辮子，你一个人帶辮子，多难看呀！同我去吧。”同时就伸手拉他。張彥彬推开营长的手，怒目而視地对营长說：“中国人历来都有辮子，怎么会难看？你要动手，就来吧！”張坚决的气概，环观的人都为之瞠目，营长看出那是一个威武不能屈的人，也就搭訕着說：“好、好，以后再讲吧。”我当时就很敬重此人。后来見他不輕言笑，却很乐于替人写家信，不受任何

報酬。同他熟习的人說，他原是教书先生，所以叫他“張先生”。我說：“你們也叫我張先生，莫弄混了。只叫他‘先生’好不好？”張在旁听見，对我一笑表示承认。从此“先生”二字就成了他的专称。有人說他的太极拳打得好得很，常常半夜起来光着上身打拳，却不肯教人。

第七天，我們那一营同其他四营，共两千多人，同搭一只英国太古公司的輪船，經日本到加拿大西岸的“梵科瓦”(Vancouver)。登輪后，翻譯住的房間和吃的飯食，都远不如輪船上的英国士兵，这是明显地違背了合同。十个翻譯同去向英国領队交涉。英国領队名发美尔(Farmer)，是天津某洋行的职员，說一口很好的北方話。他說輪船是从香港来的，已經沒有空位，翻譯的住房无法改了；伙食可以改为西餐，但須到廚房去吃，不能进餐厅，这是輪船上的規矩。上海来的翻譯也說外国輪船确有这种規矩，中国人無論怎样鬧，只能住下层的中国艙，不能住樓上的外国艙，所以我們也就委曲求全了。

輪船在日本的大阪上煤停了三天，沒让中国人上岸；到橫濱又停三天，仍然禁止中国人上岸。翻譯們根据合同向領队交涉，領队答应我們上去玩一天，但要我們保證工人們不提出同样要求；由此我們知道，英国人对于合同是沒有誠心遵守的。五个营的二千多人，挤在一条船上，經過十八天之久，沒有活动的机会，影响健康很大，害病的和吃不下飯的工人，逐天多起来。到了荒蕪的梵科瓦碼頭后，大家才到山間和海边舒展了三天，把健康恢复过来。

由梵科瓦分乘五列火車，橫穿加拿大，走了八天八夜才到哈利法克斯(Halifax)。沿途停車时，不准中国人踏上月台一步，我們始終縮在車廂里。在西段，从車中向窗外望去，只見白雪皚皚的山

峰，和在从树中时隐时现的小溪。加拿大的中部是广阔无边的干枯了的草原，既无人烟，也无房舍（除车站外）。到终点的哈利法克斯，望见了一座美丽的城市，但火车停在轮船边，下火车后，穿过月台就进轮船，根本没看见该市的内景。到法国后，在报上看见，该市因停在码头上的军火轮船的爆炸而完全毁灭时，我们都为那样美丽的城市而深为惋惜。

这只载重两万吨的轮船，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，是由俘获的德国运输舰改装的。船名“鳩丽亚斯”（Julius），身长一百零八码、其高度，从船舷数上去有十三层。威海卫和青島两处来的华工约共五千人，只住了一、二两层，其中还夹有操场和戏院。翻译住在顶层，上下乘电梯。

同路航行的还有八只轮船，听说都是万吨左右的，排列在鳩丽亚斯的四周，相距都在四百码以上，那些船上装的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商船之外，还有许多军舰和鱼雷艇保护着。向前后左右望去，都看见它们散布到天边的尽头。在行近英国的第七第八两天，听说护航的军舰增加了很多。有人用望远镜看了后说，四面都是舰队，散布到二十余英里之远。

从哈利法克斯出来以后，天天都有很大的风浪。在太平洋中经常看见的光滑如镜的洋面，在大西洋中根本没见过。第五天的风浪特别大，挨近鳩丽亚斯的轮船簸动得很险。远处的鱼雷艇，则好像在形似山岳的巨浪中穿进穿出。我们这只大船，则把涌来的巨浪，劈成瀑布似的宽大的水帘，高悬在我们的两侧。

第七天早上选了二十几个眼力特别好的华工分班到顶上去守望，每班四人，了望两小时。选去的华工，都认为担当的是关系全船一万多人的生命的重责，大家都冒着刺骨的雪风，认真负责地了

望。第八天一早，船头的两个华工发现一个可疑的“小点子”。船方用望远镜复查后，一面鸣炮告警，一面传语全船各人都捆上救生带，同时轮船也改走“之”字路线。我们看见几只小军舰向出现“小点子”的洋面驶去，放了些深水炸弹，历时两点多钟才解除警报。（防卫虽然这样严密，我们到法国三个月后，听说，这只大轮船还是被德国的潜水艇用鱼雷炸沉了。）

第八天晚間，《鳩丽亚斯》巨輪进入利物浦港，也是与火车平行停泊着，华工下輪后，穿过月台就上火车。人一上齐，就連夜开车，次晨就到英格兰东岸的“福克斯”鎮(Folks town)。我們穿过了工厂林立的英格兰中部，但什么也沒看見——为防德国飞机轰炸，車上的窗帘閉得很紧。

二

福克斯鎮上的大羣帳篷，散乱地安設在一列山边的平原上。帳篷間夹着些树木，加以帳篷頂上涂有黃一块綠一块的顏色，天空的敌机一定难于辨認。帳篷很多，大都是长方形（也有少数圓頂的），杂乱地安置在大約三个平方英里的平原上。北边住的是英兵，南边已住了一大批华工。我們一到，就有很多华工来迎接我們，替我們帶路，幫我們安設鋪位，指示我們領飯領开水和大小便的地方；然后三三两两地坐在地鋪上談起来。据說我們在那里等候小輪过英倫海峽。由于海峽中时常发现德国潜水艇，小輪时常停駛；有些人已等候三天了。吃的是面包、饼干和各种罐頭（翻譯多一样黃油），但数量有規定，装不滿肚子。尽管这样，当天晚上，許多早到的华工和翻譯，还是节省出饼干和罐頭，各自招待自己的同乡或朋友。

我們在福克斯鎮只住了一夜，就坐小輪过海。下輪后走了两点

多钟，就到华工总部所在的駱耶耳(Loyelle)。这是法国东海岸上的一个小村子，华工总部只是村外平地上搭的一些圓頂帳篷，夹着一些长方形的小木房。这与福克斯鎮不同，不但沒有树木遮掩，而且把几十个帳篷划为一組，四周用鉄絲网圍着，門口有荷枪实彈的英兵把守。我們那一营恰恰住滿一組帳篷，一进去就不准单身出来，也沒人来看望我們。

次日整营到大操場去編队，有許多荷枪的英兵隨去，也有不少英国軍官和弁目。分排列队后，每班来了一个左臂上带着一條黃色短条的英兵，每排加一个带两条的，每連加一个带三条的。后来华工都叫他們为英国“一道”、英国“两道”、英国“三道”。英国“一道”不但要管中国“一道”，有时还要管中国“三道”，也直接管华工。此外还加了中国大队长(“四道”)和英国大队长(Sergeant Major)各一人，炊事員四人、勤务員六人，又裁縫、皮匠、理发师各一个，連翻譯二人，全营合計五百人，即：

工人二十七班，每班十五人	405人
中、英工头各四十人	80人
炊事員四人、勤务員六人和翻譯二人	12人
裁縫、皮匠、理发师各一人	3人
全营合計	500人

以上这些人，在操場上編队后都算确定了，只有中国大队长后来換了两次。最后換来的冉振海是河北保定人，四十来岁，身强力大，天主教徒，能說一点英文。他原来的职业，我們虽同处将近三年，从沒听他說过。他是第一批到駱耶耳的，他說那一批有一百多人，已在駱耶耳受了一个多月的訓練。华工总办普登上校(Colonel Poulton)和会办魯斯頓上校(Colonel Ruxton)每天輪流給他們

講話。他們那一批人，已經派出來工作，最低是“三道”，一般是大隊長。他們的總隊長姓姜，外國人叫他約翰，也是華工總部的總隊長，月薪一百八十元。我後來聽說，普登是在中國生長的，在上海英國工部局搞過多年，四十歲以後調到南非洲的英國殖民地工作，新近由南非洲調來當華工總辦。魯斯頓也是從上海英國工部局來的。1930年他在上海當鹽政局稅警科的副科長。姜總隊長則是上海英國工部局的一個巡捕頭。

書歸正傳，還是說1917年11月間，在駱耶爾編隊的事吧。此時營長換為一個英國軍官，名李笛亞迪(Lydyart)，三十來歲，貴族出身，大學畢業，受過短期的軍訓。此人很會擺架子，實際卻膽小，遇到情勢嚴重時，會立即改變方向。這是後來我們從多次鬥爭中摸到的他的個性。營長之外，還加了兩個副官，其中一人會說很好的上海話，滿臉烟容，肯定是一個大癮客。這三個軍官都是英國中央政府委任的，其待遇比四十個沒有受到任命的英國弁員高得多。這三個軍官每人住一個帳篷，每人有一個勤務員。

李笛亞迪營長在操場編隊時，就說要剪“先生”的辮子。舊營長（後來編到別隊當副官）當時就把曾在威海衛想剪“先生”發辮的經過告訴了他，並說：“先生”不好惹，且會打拳。李營長說他有辦法。當天下午，他帶著姜總隊長和一個理髮師（華工）到營里來。姜總隊長身材高大，大家都聽說他精通中國和外國的拳術。他用很流利的洋涇濱英國話與李營長邊走邊談，走近“先生”的帳篷時，他才改用中國話大聲說，帶著辮子到外國來，是丟中國人的臉，叫“先生”立即剪掉。理髮師拿著剪子走攏去，但見“先生”怒目而視，不敢動手。姜總隊長逼近一步，“先生”側身，用二指在他背上點一點，姜就站不住腳，向前晃了四、五步。姜掉轉身來暴怒地說“你竟敢動手”，

跟即抓着“先生”的辮子。“先生”只用二指一捏，那只紧握辮子的右手立刻五指分散了；“先生”再用左手一推，姜即晃到营长面前，幸而营长把他扶住，沒有跌下去。圍观的中英工头都哄堂大笑，营长也笑了。姜臉紅筋脹，踱到人群后面去了。“先生”才指着姜总队长說：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丢了中国人什么臉？”他又轉过头来对李营长說：“我在威海卫就說过，我的辮子是不剪的，要剪就送我回去。現在我还是愿意回去的。”我把“先生”的話翻完后，李营长說：“算了，算了，拖着辮子也沒多大关系。”从此之后，“先生”更为全营华工所敬重，在后来的多次斗争中，他起了很好的团结本营工人的作用。

第三天午后，“先生”同我下象棋时，突然問我說：“你說长毛賊那些人好不好？”我說：“你一定贊成他們，他們都是留着头发不剪的。”“先生”又說：“有人說，长毛賊留的是滿头，不是辮子，对不对？”我說：“他們是汉人，汉人从来就留滿头，清軍入关才强迫汉人剪成辮子的。洪秀全要保存汉人的真象，当然留滿头；你是滿人，当然留辮子。”“先生”眯着一只眼睛說：“你还以为我是一个滿洲人？”

第四天下午，李营长問我那条辮子为什么剪了？我把实情告訴他后，他又說：“听说这一营的工人都很听他的話，是真的么？”我知道他在打“先生”的主意，所以答复他說：“他不大說話，工人也很少同他說話。”李营长又說：“叫他当工头，一定管得着工人。”我說他的脾气很古怪，不見得愿意干。第五天上午不知“先生”从哪里听见了这个話，他故意当着冉大队长用威胁的口吻說：“哪个要拿我去討好，他是自找苦吃。”

三

队編好后,我們被排为第十三营。在駱耶尔一共住了八天,就整队上火車,到法国东北边上的阿拉斯(Arrass)去挖战壕。原有三十多万人的阿拉斯城,經過三年多的战火,已全是敗瓦頽垣。間或看見几个妇孺,也是蓬头垢面,住在頽垣下面的地窖中,以求乞或卖淫为生。我們就在这些頽垣里搭帳篷,利用頽垣下面的空隙作地下室。遇着空襲或敌人的炮轰,就钻进地下室。我們到后,安好帳篷就吃晚飯。晚餐是每人半磅面包和一洋鉄盒子的洋山芋。洋山芋是夹着洋葱和牛肉燒的;飯量大的人可以增添一次,所以都能吃饱。吃完就去睡。睡六小时后,听見哨子响,赶即起床,又照样吃一頓,即奉令打好背包(两条軍毯、一块胶布、一条褥子、一件雨衣、两件衬衫和一套卫生褲褂),去領口粮。背包之外,挂有水瓶、胶鞋、洋鉄飯盒(內装洋鉄匙子),腋下另挂口粮袋一个。領的口粮是供三天三夜之用的,計有压紧的餅干三十六块,牛肉罐頭三个,紙烟三包(十支装),洋火一盒;翻譯多三小块黃油。

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內,有些地方,与敌方战壕的距离不过五十碼。我們是站在战壕內挖战壕,把挖出的沙土扔到前面,人身都在壕內。挖好六英尺深,三英尺寬,英兵才进来,所以我們实际是在最前綫。这与在威海卫时所訂合同中“不作战”的話,且不相符合。遇到下雨时,战壕里泥泞不堪,遇到下雪时,战壕里积雪。

多天之后，到聖誕前夕，遭受到更大的痛苦。我們初上前綫時，英國人宣傳說，他們新發明的坦克車很厲害，德國人却没有，不久之后，坦克車多了，就要大規模地進攻。那知就在聖誕前夕，大家正在談論聖誕節的禮物怎么還未來時，敵人的大炮聲和坦克的轰隆聲，震天地響了。有人伸頭望去，在月光下面已能看出，一長串的敵人的坦克車正在爬向我們。我們到后面去找英國軍官，通通不見了；回轉來時，監工的英兵也都不見了。這時有人一喊：“退回哩坡特耳(Le Portel, 這是我們來時經過的分区司令部所在地)”，大家才倉皇地后退。起初在戰壕中彎彎曲曲地跑，後來又在坎坷不平的地面上跑，一氣跑完三十幾里，到達目的地時，我們的三個軍官都已找好住處，正在找勤務員給他們安床。我們氣極了，同到司令部告狀，司令部問明我們是十三營后，叫我們先到指定的一個空商店里去安床鋪吃飯，把傷員送到醫院去，再寫報告交自己的營長轉呈。我們当晚把報告写好，大隊長冉振海不簽名，也不理他，由其余三十五個工頭(有四個工頭受傷)簽名后，面交李營長。一連兩天沒有回信。這兩天吃得較好，還可隨便走動，工人的氣也消了些。第三天叫我們到卡勒(Calais)去轉運糧食和軍需。我們知道后方比前綫好得多，不等回信就上火車去了。

卡勒是一個龐大的轉運站，要把輪船上運來的給養和各種軍需品卸入倉庫，堆上很高的垛子；再逐日把各戰區需要的物品，照上面發下的清單，從許多倉庫的高垛子上搬下裝進火車運到前方去。那里共有三個華工大營。我們住的那個大營，早已住有四營華工，加上我們就是五營了。各營之間，也像在駱耶耳的一樣，用八英尺高的鐵絲網隔開，門口有英兵把守，不准華工隨便出入。每個鐵絲網內，有十四棟長方形的木房，每房能安五十人的地鋪。地板之

下就是防空壕。木房前面有个操场，供排队和打篮球之用。除三个军官住在附近的特区外，全营都在一个圈里，厨房和厕所也都在内，所以大家都认为比前线好多了。但从次日起，烦恼的事情，就接二连三地发生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一个英国工头从厕所中拉出一个华工，要罚他立正五分钟，说那是英国人的厕所，中国人不该去。这就引起全体华工的情怒。英国工头都围起来替他们的人助威，大队长冉振海也帮助英国工头，说各营华工都遵守那个定章。在大队长提到所谓定章时，新出现的英国军官的威风立即高涨，说：“以后一切要守规则，违反者，轻则罚站，重则罚禁闭，罚劳役，受罚两次不改，就要送到英雄队去。”我们谁都没见过英雄队，合同中也无这样的规定。但大队长冉振海却活神活现地说：他在骆驼耳见过，说队里的英雄，谁也不敢乱说乱动，说每天工作十六小时，吃的都是冷的，一不听話就用皮鞭打，用开水淋身，用铁丝刷子刷皮等等。

午后到粮站去装车。大家都还不懂怎样做法。中国工头与英国工头之间话也不通，两个翻译又应接不及，而英国工头同粮站上的英国人却又乱骂起来了。中国工头责备英国工头说：“你们应该先学会再来教给我们看，那有不教不看就会做好的事？你们说的办法不符合站上的要求。站上吵起来，你们怎么又不负责？”粮站的英国人这才看清事情的真相，对中国工头具体地讲明作法，才解决了纷乱的状态。但时间已耽误了很多，五点钟下班时，只装好四车，还差四车。因为每营半天该装八车，每天该装十六车。工人毫不含糊地说：“今晚再干，合情合理的工作，我们决不推辞。”

当晚，干了一个多小时就装满了四车。以后也是半天四小时的工作，三个小时就作完。但英国人既不许我们提早散工，也不承认

工間休息，意图胁迫我們加工。这种額外加工，不但我們不承认，同一大营的其余四营的华工也不承认。因此我們就“慢慢来”了，或者自由休息。有一天，营长带着冉振海到工地来，到处罵人，說工作慢啦，說工作方法笨啦，說这人那人为什么闲游啦。冉振海也帮着罵，还帮着清查“怠工”的人。后来他們又罵抬鋼軌的工人为什么走得那么慢，还在鋼軌的中間用双手死力向前推。不料两头抬鋼軌的工人同时一撒手，压得他們臉紅筋脹，才垂头丧气而去。

当天晚上，从阿拉斯退却时受伤較輕的十二人回来了。他們說，还有两个受重伤的人不知何日才能回来；說医生給他們取破彈片时不用麻药，把他們綑在手术床上开刀，弄得他們叫娘叫爷地痛苦万分。全营工人都气憤极了。“先生”却劝大家：“鬧尽管鬧，沒有計劃好，万勿动手，英国人显然想打我們一个下馬威。”

次晨排队分派工作时，有几个人同时高声喊，“吃不飽，做不动，要减少工作。”接着大家都同样喊。我翻譯成英語后，李营长答复說：“英国食品营养好，肚子沒装滿也不致缺乏营养，而且英国工头也是一样吃法。”大家答复說：“我們也做英国工头那样的輕微劳动行不行？”同时就嘈喳起来。李营长見情况不好，就改口說：“莫乱，好好上工去，我去同司令部商量再說。”

工人中午回营时，見鉄絲网外面排列着許多荷枪实彈的英国兵；进营房后，又見昨天才从医院回来的一个工人，被冉大队长打得周身青紫，說他造谣生事。于是一声喊“大家打”，冉振海立即被拖到操場中，起初是拳打脚踢，后来則用他打人的那条棍子，向他周身乱抽，大家輪流打，同时也教他的罪状，直到他磕头求饒，甘愿永不再犯，才有人劝說：“住手，去吃午飯。”打的时候，英国人都躲开了，不敢露面。大家吃飯时，才有几个英国工头出来，不声不响地

把他和先被他打伤的那个工人，一同送到医院去。饭后，工人有些在洗衣，有些在下棋，有些整理房間，有些拉胡琴，一点沒有上工的表现。这时上工钟点早已过去，但没人吹哨子（平时是冉振海吹的），也没有人敢問。两点半左右，营长叫勤务員找我去，先問了騷乱的原因（显然是明知故問，冉大队长业已承认打人是他叫的），然后問工人預备怎么办。我告訴他我听见很多人說：“不撤兵、不加口粮，不上工。”营长用可怜的語調說：“这些事不是我能作主的呀！”

4点钟左右，营长又派那个勤务員請我去說，“一个乱子过去了，第二个乱子又来囉，怎么办呀？”他又說：“前綫出了大問題，每营必須連夜赶装六十二輛車皮的給养去，本营連今天下午耽誤的八車，共該装七十輛車出去呀。”我問他，別营怎么办？他說：“附近四营都鬧起来了，今天下午都沒上工。看来，他們是受本营的影响，本营不解决，別营也解决不了！”我說：“工人都是讲情讲理的，只要合情合理，事情没有什么难办，錯是錯在大队长不該打人。”营长忽然提起精神說：“你这个話有把握嗎？”我說，“我是中国人嘛。中国人把情理二字看得非常重，不讲情理就会拼命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。”营长說：“好，好，我就到司令部去。”

不到半点钟，鉄絲网外面的英兵撤走了，营长也接着就回来，在門口就招手叫我进去說：“口粮沒有問題，要紧是今晚装出七十輛車的給养去。你立刻就去对工人說，我派一个人与你同去。”我說：“这不好。你不相信我，叫工人站队，你直接同大家說好囉。”他說：“到底带头人是谁呀？”我說：“沒有带头人，是大家的公憤。”他說：“冉大队长打的那个人，不是带头人嗎？”我說：“絕對不是。他被打到半死后，并沒說什么嘛。”

我一进工头房，大家也都圍攏来。听我說完后，“先生”首先

說：“該收帆了，我們也該顯一手給他們看看。”另一人說：“我們那五條可以提囉。”又有人說：“他們正在找帶頭人，莫露頭，叫他先對大家說。我們一唱百和，大家提。站隊莫分排分連，提條件的人站在中間或後面。”

我回報後，李營長还有点怕又鬧亂子。我又說：“工人肯定是講情講理的”。他才叫英國大隊長吹哨子。這次他對大家說話非常客氣了。他說：“英兵已經撤了，加口糧也不成問題，要緊的是趕快裝出七十輛車皮”；并且說：“司令部怕大家太辛苦，預備派一百個英國兵來幫忙。”有個工人大聲喊：“口糧要吃得飽，加夜工要加餐。”跟即大家一齊附和。我翻譯後，營長連聲說：“是、是。”又有人喊：“工作方法我們自己定，車子裝齊就收工”，營長答复說：“你們能够自己作得好，那就更好嘛。”第三個條件是門卫由工人自己管。第四個條件是華工交朋結友不得干涉。第五個條件是非經宣布罪狀不得調走本營中國人。臨時又加上一條：叫派來幫助裝車的英國人分開工作，我們要同他們比賽。這些條件李營長完全應承，只說只要等司令部批准。話談完後，華工自動散去催飯吃。英國大隊長未敢干涉。李營長熱情地同我拉手，我才發現他滿頭大汗——雖然操場之外遍地都是雪。

当晚6点1刻开工，大家不但做得很迅速，很有条理，而且創造了些新办法。如垛子上的大包，不用人背下来，而用木板滑下来；把車皮先移近一个貨堆，裝齊之後再移近另一貨堆去；除三个“三道”作联系工作外，其余工头都与工人一样背东西。一些英國工头，起初說我們弄糟了，工人叫他們莫管，站开些，我們自有办法。后来他們也都說中國人真聰明。10点來鐘又吃一餐，英國工头无事可作，自告奋勇，替我們回營去抬飯。到次晨6点钟，天還沒亮（法